

潮陽路八千：古代中原與邊陲的概念及相關措施

鄭錦全

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

歷代文人學士從京師發放到外地，對邊陲的地理距離有極其遙遠的感受。例如唐代，柳宗元謫官柳州，他說是“一身去國六千里，萬死投荒十二年”；韓愈被貶到嶺南，詩作寫道，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”；楊炎被流放到海南，有詩句“一去一萬里，千知千不還”。實際上，各貶謫地與王畿的距離並沒有六千到一萬華里，而是因為自古以來形成的中原的概念，使人覺得邊陲是數千里之外的蠻荒地區。我們利用地理資訊系統，從語言互動的範圍討論語言社區的大小，從而延伸到人間交際的遠近。西周、春秋、戰國世家女子隨嫁的青銅媵器的銘文所反映的婚嫁距離大都不超過 700 公里，漢代應劭《風俗通義》所記載口耳相傳的故事發源地也大致在以河南為中原的 700 公里內。中原 700 公里外就被視為蠻荒邊陲，因此古代的謫官大都發放到 700 公里外。漢唐盛世的賈誼、韓愈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元稹、白居易、李德裕，宋代的范仲淹、蘇軾、黃庭堅等都是如此。元代幅員遼闊，“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，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”，也是王畿 700 公里之外。我們從方言社區的研究延伸到社會互動，提出 700 公里古代人間交際範圍，解釋華夏中原與邊陲概念的形成，以 700 公里為分野的理念解釋歷代政治社會措施。